

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看中共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掘^{〔*〕}

李 燕

(北京教育学院 历史系,北京 100120)

〔摘要〕作为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体,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生发于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凝练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邃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民族精神、传统谱系文化以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用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构建起自身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要义可从理想信念、党性宗旨、作风品格三个方面把握,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相对应,是新时代下对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这恰是中共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5.015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命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等场合予以重要论述。以此为契机,学界对这一精神谱系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基因展开热烈讨论,并取得重要成果。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既有研究还存在内容分布不均、学科视角不广、缺乏问题意识等现象,探讨构筑具体形式等问题的成果还较少,应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予以优化。^{〔1〕}为此,本文尝试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在借鉴

社会学、民族学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从内涵要义和结构形式角度,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对伟大民族精神、传统谱系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探讨中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掘,以期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深化。

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体,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在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发展的。早在2005年,习近平已从系列精神的角度论及“红船精神”,他指

作者简介:李燕,历史学博士,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历史教育。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开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程与经验研究”(17CKS017)的阶段性成果。

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它“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2]该文发表后，南湖区委曾从中国革命精神的角度进行学习讨论。^[3]2017年，他重申这一精神，要求结合时代特点予以弘扬。^[4]2009、2014年，习近平两次论及焦裕禄精神，此外，他还就抗美援朝精神（2010）、苏区精神（2011）等进行论述。

2021年，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

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5]这是他首次从整体上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进行表述。在此后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讲话上，他又论述了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他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6]同年，党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据此整理后，如表1所示：^[7]

表 1

时期	人物（群）类	地域类	事件（物）类	现象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东北抗联精神、张思德精神	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照金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神	建党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抗战精神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王杰精神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	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女排精神	特区精神、青藏铁路精神	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改革开放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	丝路精神	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	“三牛”精神

由上表可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涉及4个时期、4个类别。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地域类的精神最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事件（物）类的精神最多，而从地域类的精神名称来看，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实践的地域也不断拓展，这符合历史和现实发展的逻辑，也反映出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

从学界来看，2008—2020年，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或横向探讨某一精神的内涵、价值或某位领袖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论述，或纵向梳理不同时期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谱系，或整体论及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赓续与弘扬。^[8]就目前资料所及，较早系统论述的可以追溯到2016年的陈晋《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解读》。该文提出，毛泽东对中共伟大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后习近平同志加以概括、提炼,党的伟大精神可从理论、历史和实践角度认识概括,这一精神谱系拥有连贯的思想内核、厚重的实践属性、崇高的道德力量、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特征,在民族精神方面,主要涉及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理想、摩顶放踵与艰苦奋斗、舍生取义与英雄气概、知行合一与实事求是、自强不息与独立自主等。^[9]时玉柱曾对习近平论述中共革命精神、提炼精神谱系的问题进行梳理。^[10]

2021年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上述重要讲话后,这一问题迅速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学者们就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生成逻辑、内涵特点、时代价值、基本经验等问题展开整体研究和个案考察。同时,相关学术会议的召开,^[11]也为研究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学界多从历史、理论、实践等向度探讨这一谱系的生成逻辑,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是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相互推进的结果,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需要,^[12]其精髓要义包括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为民情怀、开拓创新、艰苦奋斗、道德品质等方面,^[13]其基本特征体现在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14]其中蕴涵的实践性、人民性、创新性和科学性等共性特征,体现着一系列精神形态与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承、同根同源的紧密联系。^[15]

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传统文化关系问题上,有学者表示,其内核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生成基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伟大建党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第一个精神成果;^[16]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为党构筑中国精神谱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活水之源,^[17]百年党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主要是“义以为上”的价值取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刚正不阿的气节操守、“知行合一”的认识理性,^[18]等等。

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形成与发展来看,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同时,其内涵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与此同时,学界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相关认识不断深化。在此过程中,政治与学术也体现出积极的互动关系。

二、从内涵要义看“精神谱系”对伟大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如前所述,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9]中共正是在弘扬这一精神的百年奋斗中,才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习近平强调,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20]这里就涉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伟大建党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以及后两种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伟大建党精神,已有学者指出,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二者并非同一逻辑层面的概念表达,也不是处于时间先后的排列关系,伟大建党精神通过其“母体机制”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践主题下,具象化为不同的精神样态,这些不同系列的精神样态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21]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十分丰富,作为其中一个重要范畴,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与本、根与魂,是贯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一条红线。^[22]历史地看,中共自成立以来,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并将“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23]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可以说,伟大建党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责任担当、精神风貌、崇高情怀和价值追求,而这正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内涵要义的生动诠释。

关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每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其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就是其中起主导作

用的基本精神。同时,民族精神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演进,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就构成相应的时代精神。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24]“‘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25]从历史的实际看,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逐渐形成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共同构成了中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包括劳模精神在内的诸多精神样态,从不同角度体现和丰富了中国精神的内涵。

在这个前提下,要进一步厘清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内涵要义对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就有必要回顾和梳理中共关于民族精神的论述。对此,毛泽东曾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26]邓小平说:“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27]江泽民指出:“中华民族的精神,最突出的就是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精神。”^[28]胡锦涛指出:“要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29]习近平强调:“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30]并将民族精神的内涵进一步概括为“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31]显然,中共领导人始终重视弘扬民族精神,并结合时代特点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内涵。

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所形成的系列精神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32]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要义可从理想信念、党性宗旨、作风品格三个方面把握,这也正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相对应。

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33]例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其中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就是坚持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坚守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不仅如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还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使真理继续发展。

就其党性宗旨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34]这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张思德精神。2009年,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时指出,焦裕禄同志以实际行动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

宗旨,也是焦裕禄精神的本质所在。^[35]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张思德精神,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劳模精神,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科学精神,这里的人物(群)类精神主体既有普通党员,也有党的干部,既有党领导的个体,也有党领导或组织的群体,这些精神不约而同地体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这也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就作风品格来说,它既包含党历来坚持的优良作风,如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作风,^[36]又涉及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质要求,如对党忠诚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公德、严于律己的品德,^[37]“坚持原则”的重要品格,^[38]“勇于自我革命”的独特品格,^[39]等等,而党在实践中锤炼的“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则是其“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40]通过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党的政治品格和个人的伦理品格统一起来,党的风骨品质和个人的气节人格统一起来。

例如,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41]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而长征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42]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43]这种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充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而视死如归、自强不息、不畏艰苦、甘于奉献等民族气节品格、革命乐观主义和忠诚精神,则是对谱系中道德品质和风骨品质的深刻诠释。

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要义确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所对应,其中的系列精神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党性宗旨、作风品格,体现出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三、从结构形式看“精神谱系”对传统谱系文化的扬弃与超越

就其结构形式而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还体现出对传统谱系文化的扬弃与超越。而从更深层次看,后者是由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衍生而来。

认同问题是随着人类出现而产生的,它涉及人类心理和社会行为。从西方的研究来看,它最初是柏拉图、笛卡尔和弗洛伊德等人从哲学、心理学角度分析人的自我认同,进入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后,被用于考察个体与群体、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社会认同理论发展出社会分类、社会认同、社会比较和心理群体的独特性四个基本概念。泰弗尔(Tajfel)认为,社会认同是指“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44]

考察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实际和民族实际,有一个由氏族到族群的演进过程,^[45]随着氏族制度的瓦解,人们的社会关系也由以血缘为纽带转变为以地缘为纽带,国家产生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说:“由血缘关系形成和联结起来的旧的氏族公社已经很不够了……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

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46]与之相伴而生的,则是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作为人的社会属性表现形式,文化认同构成“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中介形式”。^[47]在传统宗法社会,谱系文化是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的一种突出反映。

谱系又称系谱,一般是指谱表的系统,本指族群、物群的联系,后来被引介到多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史记·三代之世表》载:“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正义》曰:“谱,布也,列其事也。”谍,《索隐》曰:“音牒。牒者,纪系谥之书也。”^[48]从概念来说,谱是对人物事迹的记载,牒记载世系谥号。司马迁表示,殷商以前的诸侯事迹无从记载,而周代以来这类事迹则颇多。自己读记载系谥的书,黄帝以下都有年数,参考历代记载帝王更替的谱牒,记载颇有出入。因此,他根据《五帝系谍》《尚书》对黄帝至周代共和的事迹作《世表》。

对此,有学者指出,《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三代世表》,曾记载周代及以前的各血缘集团世系,结合甲骨、金文和民族、民俗学资料看,至迟在商代,已出现记载世系、人名的家谱,此外还有结绳家谱和口述家谱,母系氏族社会是人类血缘关系发展的鼎盛期,人类的系谱知识也由此萌发。^[49]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从民族学的资料看,人类自进入氏族社会后,就形成了对血缘世系计算的习惯和方法,从而产生反映血缘关系的谱系,这种谱系有早期的氏族谱系和后来的家族谱系两种类型。家族谱系产生于家族起源后的母系氏族晚期,反映家族与家庭的血缘关系的谱系出现,也就是家谱的起源。^[50]

随着社会的演进,西周在商代宗族制度基础上,通过周公制礼作乐建立起较为系统的宗法制度,其核心内容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等。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专人记载宗族世系。宗法制度亲亲尊尊、尊祖敬宗,其

本质是血缘关系的政治化。于是,反映宗族世系血缘亲疏关系的谱牒便成为宗法制度的重要依据。

对此,清人邵晋涵曾说:“《周官》小史‘奠系世,辨昭穆’,谱牒之掌,古有专官。自官失其传,《大戴记》首述系姓,后如杜预之《春秋世族谱》,则以谱学附之于经。至应劭之述系姓,王符之论氏姓,又辅经而行者也。自太史公征引《世本》,考得姓受氏之原,至《唐书·宰相世系表》则以谱学附之于史。……五代以后,谱学散佚,于是士大夫之述家谱者,或推始迁之祖,或述五世之宗,守近而不能溯远,仅以叙同居之昭穆,而于受姓别族之源流多未暇及。谱学之失传,所从来远矣”,“夫自奠系牒之官废,而后有专门之学;专门之学衰,而后有私家之谱:自古迄今,凡三变焉。”^[51]

邵氏认为,周代小史撰定帝系和《世本》,辨别昭穆次序,专掌谱牒之学。天子失官后,由《大戴礼记》首先记述黄帝以来的帝王世系及族姓由来。魏晋时期,杜预以谱学附于经部。《史记》《唐书》则以谱学附于史部。自五代以后,谱学衰落,于是私家修谱逐渐兴起。这里指出了谱牒三个阶段的学术形态演变,即由周代专官之掌经魏晋专门之学至宋代私家之谱。

对此,章学诚也有论述,其曰:“古者,瞽矇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国语》所谓‘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者,是也。然则奠系之属,掌于小史,诵于瞽矇,先王所重;盖以尊人道而追本始也。”^[52]章氏表示,古代由小史撰世系、瞽矇诵世系,旨在劝诫人君、追本溯源,这里也体现出世系兼有追本始、行教化的功用。

魏晋至六朝,族望渐崇,士大夫承袭汉代私修谱系的传统而往往自撰族谱,以此记述世系职官和重要事迹,如名字、姓氏、籍贯、年龄、职官、婚姻、著述等,在血缘上,以直系亲属为主,兼采旁系,在性别上,以男性为主,男女并书。关于魏晋至五代时期的谱系功用及其学术兴衰,郑樵亦曾论及,他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

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53]自魏设立九品中正制以来,门第成为选官和婚配的标准,人们对门第日渐崇尚。门阀制度使得士族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加之政权更迭带来的人口流徙、民族聚居,以致谱系窜乱乃至伪造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别尊卑贵贱,官方曾设图谱局,以管理和考定百姓家族谱系。这一时期,随着修谱之风的盛行,专门的谱系之学迅速发展。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的推行,特别是唐朝《氏族志》《姓氏录》《大唐氏族系录》等官修谱牒的出现,姓氏排列标准也由门第名望的高低转变为政治地位、官阶的高低,这些举措有力打击了旧士族势力。

五代以来,谱系之学由盛转衰,但修谱现象仍然存在。宋代私家修谱盛行,在功能上更强调尊祖敬宗、统宗收族的伦理教化之义。谱系之学除了族谱、家谱,还以年谱等形态出现。清人多以世系谱牒入“家史”,故而年谱在这一时期更加盛行。在结构上,年谱多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线索,择取行状、墓志铭、年表、传记等相关材料,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并述论谱主事迹。在时间和作者方面,年谱既有当时所作也有后来补作,既有自作也有他作,其中,他作者多为谱主后裔或门生师友,而谱主往往是学者或政治家,并以两者兼具者为最多,这也是当时社会选官用人制度的一种反映。

事实上,人们重视谱系的这一传统不仅体现在宗族的赓续方面,也体现在学派的传承上。而在学术史上,最具典型性的当属儒家的“道统”论。众所周知,先秦以来,儒者称引“圣人之道”多以周、孔并举,唐代周、孔分祀后,自韩愈作《原

道》“辟佛”而跻升孟子,孔、孟遂由“道统”而发生关联,并形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儒家统系。在北宋孙复、石介、二程、朱熹诸儒的努力下,儒家“道统”论也不断丰富和系统化,对于维护当时以儒学为代表的学术观念、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自此,“孔孟之道”取“周孔之道”而代之,几乎成为儒学的代名词。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孔孟之道”这类表述仍多见于陈独秀等中共早期领袖和其他知识分子的著述中。明清以降,又有学者提倡回归“周孔”,而为政者也经由官学、科举制、释典礼等途径参与其中,显示出儒家道统内部、道统与治统之间的张力。^[54]

民俗学认为,民俗的核心问题是人的文化问题,但民俗是共同体的产物,所以这里所说的“人”是群体的人,也就是族群。族群在相处过程中形成民俗传统,因而族群谱系具有共同的习俗和文化价值观。^[55]实际上,无论是司马迁《史记》的帝王世系记载,还是北朝至隋唐的谱系修撰,抑或是儒家“道统”论的建构,这些现象都表明,谱系不仅是记载事迹、彰显功绩的有力载体,更是传统宗法社会维系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

当然,众所周知,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制度等方面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陈旧过时的东西,谱系文化亦不例外。对于传统的谱系文化,同样要发掘其中优秀的内涵价值,结合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事实上,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习近平曾在论述长征精神时提及这一“族谱”,他指出:“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56]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生发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伟大实践,凝练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邃理论,在名称上,既包含时空概念,又涉及人物群体,既涵盖具体事件,又囊括历史现象;在历程上,跨越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不同历史时期。以人物(群)类精神为例,其中既有党的领袖人物,也有党的各级组织及其成员,既有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有党组织的人民群众,如党的干部方志敏、焦裕禄、孔繁森等,普通党员张思德、王杰等。而地域类精神中,延安、西柏坡、南梁、吕梁、红旗渠等,则涉及党的各级组织或活动所在地。众多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个人、英雄模范等人物或人群的先进事迹,凝练着他们共同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作风品格。他们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传承爱国、民本、奋斗、忠诚等优秀民族精神的同时,也早已超越单纯的血缘、门第、性别等束缚,而无宗族或学派之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鲜明的政治品格。

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再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基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赋予民族精神、传统谱系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用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构建起自身精神谱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恰是中共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

注释:

- [1] 杨鑫、邓建超:《近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研究述评》,《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 [2] 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光明日报》2005年6月21日。
- [3] 《学在深处 干在实处》,《嘉兴日报》2005年6月30日。
- [4] 习近平:《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98页。
- [5][32][40] 习近平:《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突出重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14页。
- [6][19][2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7、7.4页。

[7]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正式发布》,《人民日报》2021年9月30日。除前述红船精神外,还有五四精神、上海精神、北京冬奥精神、中非友好合作精神等未体现在其中,限于篇幅和主题,本研究暂对第一批伟大精神进行分类和讨论。

[8] 如李捷、韩洪泉、夏远生分别对红船精神、长征精神、中共领导人与革命精神谱系进行个案考察,详李捷:《“红船精神”领航新时代》,《红旗文稿》2018年第13期;韩洪泉:《长征精神谱系述论》,《苏区研究》2019年第4期;夏远生:《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光大革命精神谱系》,《新湘评论》2018年第21期。此外,学者们还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及其谱系进行整体考察,如陈水林:《中国共产党精神财富的内容结构与传承规律》,《党史文苑》2008年第12期;朱永刚:《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演化逻辑、共生特质与传承创新研究》,《学习论坛》2019年第8期;齐彪、邢济萍:《中国共产党精神及其谱系探析》,《前线》2020年第11期。

[9] 陈晋:《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解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10] 时玉柱:《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新论述》,《红色文化资源研究》2017年第2期。

[11] 如2021年6月11日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与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讨会,2021年7月9日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共一大纪念馆联合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论研讨会,2021年10月9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指导、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承办的“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首届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学术研讨会”等。

[12] 彭冰冰:《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生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13] 王易:《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百年流变、精髓要义及赓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14] 高振岗、王廷栋:《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构筑的逻辑理路、共性特征及经验总结》,《理论导刊》2022年第4期。

[15] 王炳林、张雨:《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关系探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16] 李金哲:《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百年流变的四维图谱》,《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9月29日。

[17] 邹绍清:《论中国共产党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18] 史雨川、陈桂蓉:《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古田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20] 习近平:《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

第322页。

[21]张明:《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关系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22]曲青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人民日报》2021年7月8日。

[24]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1年,第40页。

[25]习近平:《实干才能梦想成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1年,第46页。

[26]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3页。

[27]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9页。

[28]江泽民:《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0页。

[29]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3页。

[3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3-34页。

[31]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

[33][38]习近平:《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22、531页。

[34]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页。

[35]习近平:《结合新的实际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求是》2009年第10期。

[36]习近平:《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1年,第366页。

[37]习近平:《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20页。

[39]习近平:《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41-542页。

[41]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4日。

[42][56]习近平:《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7、48页。

[43]习近平:《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2022年,第74页。

[44]转引自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心

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3期。

[45]民族,有学者也称为族群。徐杰舜认为,两者区别在于,从性质上,族群强调文化性,民族则强调政治性;从社会效果上,族群显示的是学术性,民族显示的是法律性;从使用范围上,族群概念较民族更宽泛。两者的联系是,族群可能是一个民族,也可能不是一个民族,而民族不仅可以称为族群,还可以包括若干不同的族群。丁新则认为,族群实现不了身份识别的功能,民族认同区分的边界清晰,讨论才有效和有意义,民族认同最早来源于血缘认同,但必须超越血缘认同,超越后仍然不能完全摒弃血缘认同。本研究旨在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讨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产生,此处“民族”的外延与“族群”更接近,而非通俗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考虑社会学、民族学的术语规范,也为避免行文混淆,故采用徐说。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族群认同,本研究同意丁新“超越血缘认同后仍不能完全摒弃血缘认同”的观点,这点在民族学个案研究中也多有证实。此外,就本研究而言,族群认同也并非凝滞不动,而是相对动态的。前引文详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丁新:《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华夏认同的产生》,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4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7页。

[47]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48][汉]司马迁:《史记》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87-488页。

[49]杨冬荃:《中国家谱起源研究》,中国谱牒学研究会:《谱牒学研究》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8-80页。

[50]黎小龙:《从民族学资料看家谱的起源》,中国谱牒学研究会:《谱牒学研究》第3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26页。

[51][清]邵晋涵:《余姚史氏宗谱序》,《浙江文丛 邵晋涵集》第7册,李嘉翼、祝鸿杰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860-1861页。

[52][清]章学诚:《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文史通义校注》(中),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722页。

[53][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上),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页。

[54]李燕:《由“周孔”而“孔孟”:儒家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圣人之道”》,《安徽史学》2016年第4期。

[55]田兆元:《民俗研究的谱系观念与研究实践——以东海海岛信仰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责任编辑:陶婷婷]